

双头鹰文库

方珊 张冰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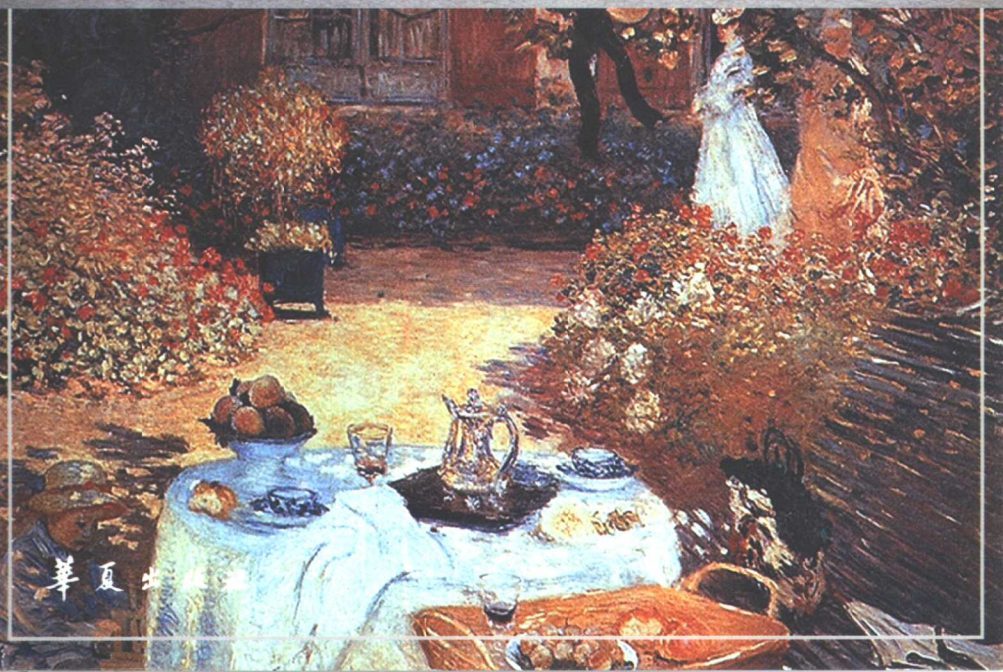


A H E M A T U O W A Z H A J I

阿赫玛托娃札记（二）

诗的蒙难

[俄] 莉季娅·丘科夫斯卡娅 著



华夏出版社

诗的蒙难

阿赫玛托娃札记(二)

1952~1962

[俄]利季娅·丘科芙斯卡娅 著

林晓梅 范荣丹

陈炎琰 管玉红

张 冰 校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的蒙难·阿赫玛托娃札记 2:/(俄罗斯)丘科芙斯基卡娅著;
林晓梅等译.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1

(双头鹰文库)

ISBN 7-5080-2340-4

I. 诗… II. ①丘… ②林… III. 日记-作品集-俄罗斯
- 现代 IV. I5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8662 号

Записки об Анне Ахматовой 1952 - 1962

© Е. Ц. Чуковская, 1997

© А. М. Юликов,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е оформление, 1997

© 《Согласие》, 1997

本书俄文版于 1997 年出版,版权为 Согласие 所有。

本书中文版权由 Согласие 授予华夏出版社,版权为华夏出版社所有。

未经出版者书面允许,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内容。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先锋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17.5 印张 432 千字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33.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总 序

方 珊

俄罗斯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绚丽的明珠,尽管它历经磨难,仍不失其灿烂耀眼的光辉。

俄罗斯文化的历史渊源应追溯到生活在第聂伯河和德涅斯特河之间的古斯拉夫人。公元6—7世纪时,斯拉夫人信仰的还是多神教,从事农耕生产。原始公社解体后,开始了封建化的历程。9—10世纪,斯拉夫人接受了基督教,成为斯拉夫文化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表明斯拉夫文化进入基督教文化圈。1054年东西基督教会分裂,使基督教文明分为西方教会与东方教会两大形态。俄罗斯人则与塞尔维亚人、黑山人、马其顿人和保加利亚人属于东正教文化圈,深受拜占庭文化的影响,这从基辅罗斯时期的语言、宗教与文艺中可以得到充分反映。古代罗斯所建的索菲亚教堂鲜明体现了其与君士坦丁堡的文化联系。

拜占庭文化尽管其宗教信仰是基督教,但它仍保留着希腊式文化,使用的是古罗马法,并按罗马帝国模式来治理国家,这样,拜占庭文化特点不仅由其处于亚欧交界的地理位置所左右,而且也由其连结西方的拉丁基督教与东方的伊斯兰教的桥梁所决定。这些文化特点也深深地烙印在俄罗斯文化之中。

13世纪蒙古人入侵俄罗斯,俄罗斯人进行了顽强斗争,并于1480年摆脱了鞑靼蒙古的统治,建立起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国家。随后经反复无常的伊凡强行建立的沙皇独裁政府,于罗曼诺夫王朝形成了统一的俄罗斯帝国。彼得大帝一方面巩固着专制国家体制使农民沦为农奴,另一方面也在学习西欧国家大力推行改革,开始了俄罗斯帝国的现代化转型。叶卡特琳娜女皇也是如法炮制,一方面尊重欧洲兴起的启蒙运动,推行一些政策改革,但同时却扩大农奴制,并通过“贵族宪章”使贵族拥有农奴的永久权利,以至于启蒙运动在欧洲曾作为资产阶级兴起的思想武器,而在俄国却被用来作为完成早已开始的君主集权制的工具。1861年,俄国总算颁布了解放农奴法令,可农奴的解放并未使俄国农民成为西方国家意义上的公民,却仍受到村社、家庭的束缚,并没有个人自由。俄罗斯帝国就这样一直在缓步推行西方化与维护专制统治之间游弋,俄罗斯思想界也一直处在西化派与斯拉夫派既相冲突又相联系的张力场中。

19世纪的俄国已从普鲁士边界延伸至太平洋,成为一个横跨欧亚两洲的大国,辽阔广袤的疆土却并没有建立起严密的秩序,这使俄罗斯既不满于自己在欧洲的地位,又无力为自己谋求更大的霸权。俄罗斯素有肩负某种伟大神圣使命的宗教理念:莫斯科是第三罗马。这已深深渗透在俄罗斯人的文化精神中,成为俄罗斯民族之魂。有道是,英美人喜谈体育运动,法国人喜谈女人,俄国人则爱谈宗教和上帝的奥秘。因而俄国人有了“上帝使者”、“上帝追求者”之感。俄国人特有的虔敬感、同情感、

羞涩感带有强烈的宗教气息,他们注重敬拜甚于讲道,对上帝和神性真理怀有热切的思慕,对不幸与受苦者怀有深深的同情与宽恕,对不公正的待遇逆来顺受,以及对神圣象征和神秘主义怀着忠诚。东西方的矛盾冲突构成了俄罗斯灵魂深处的悖论,以至于用理性难以悟解。正如丘特切夫的诗:

俄罗斯并非理智可以悟解,
普通的尺度无法对之衡量:
它具有的是特殊的性格——
惟一适用于俄罗斯的是信仰。

民粹主义、斯拉夫主义、无政府主义、不抵抗主义、虚无主义、信仰崇拜等等思想体系构成了俄罗斯民族的多棱镜,为我们窥见俄罗斯灵魂提供了窗口。

俄罗斯知识分子是俄罗斯灵魂的代表。他们在西方文化与俄罗斯文化的持续碰撞中,不断地以西方思想审视俄罗斯生活,又以俄罗斯的情感审视着西方生活,由此带来了一系列反省与批判,促使俄罗斯文化逐步融合着东西方文化。亦如别尔嘉耶夫所说:“俄罗斯应该意识到自己也是西方,是东西方的综合,是两个世界的联结点,而非分界线。”这鲜明表现在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成长过程中。自18世纪以来,俄罗斯知识分子纷繁复杂的心路历程,折射出俄罗斯的现代化转型之艰难。这在20世纪表现得更为鲜明、更为强烈。正因为如此,使中国人悟解俄罗斯文化增加了相当的难度。我们将尽力勉励自己,鞭策自己;为实现此目的而努力,读者亦须警醒自己:除了

理解还需悟解。在此,任何走捷径与省力的打算,都会导致误解与片面。

翻译是一种跨语种、跨民族、跨文化的沟通,它为中国与外国文化之间架起友谊的桥梁,以便消除相互之间由于语言不通产生的隔膜、偏见与误解,使世界各国人民的精神文化得以交流与传播。它同时亦是一种对话,它将使各民族、各个国家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多元对话成为可能。

中俄之间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尤其是本世纪以来,中国深受俄罗斯文化影响。不过由于当时各种原因,中国对俄罗斯文化的了解仍有缺失。近年来,随着俄罗斯改革的深化与中国的开放,国内已陆续出版了俄罗斯文化丛书(如白银时期),介绍了为中国读者甚少了解的俄罗斯宗教哲学家与流放西方的思想家,这无疑有助于国人全面了解俄罗斯文化。

值此新世纪来临之际,中国正走向世界,世界亦在走入中国。本文库愿与学术界同仁共同完成这一伟业,欢迎学术界同仁积极参与,献计献策,批评指正。文库愿益于中国21世纪新文化之建构,愿益于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健全发展,愿益于中俄及中外文化之交流,愿益于中国与俄罗斯以及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与对话。但愿学术界同仁与广大读者关心、爱护本文库,使其与新世纪携手共进。

殷殷期盼焉,是为序。

目 录

历史的一页	(1)
一九五二年	(21)
一九五三年	(35)
一九五四年	(58)
一九五五年	(79)
一九五六年	(140)
一九五七年	(197)
一九五八年	(236)
一九五九年	(302)
一九六〇年	(323)
一九六一年	(397)
一九六二年	(415)
安娜·阿赫玛托娃诗作一束	(513)

历史的一页

1946年8月1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一个特别决议：撤销《列宁格勒》杂志并改组《星》杂志编辑部。

这两种杂志的罪名如下：“为左琴科的卑鄙下流、诽谤污蔑的言论和阿赫玛托娃的空泛无物、不问政治的诗作提供了场所”；领导者出于个人的交情使“这种与苏联文艺格格不入的、无所事事、不问政治的低级趣味蒙混入杂志”；更严重的是“滋养了不符合苏联人民的、向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卑躬屈膝的情绪”。

编辑部的领导人犯了错误，但作协和国家委员会的领导们却看穿了这种无所事事的拖拉和这种文化的蔓延。

杂志的错误在于它刊载了有大量谬误的作品。

他们把列宁主义的一条重要原理抛在脑后：列宁教导我们不能培养青少年藐视一切的思想。

列宁主义与藐视主义是水火不容的。

除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外，8月14日的决议还点名提到其他几个与人民敌对的庸俗的文学家、剧作家、编剧。但其中最与人民为敌的、最庸俗且最具毒害性的要数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他们作品的思想对培养青少年朝气蓬勃、乐观向上的精神是极其有害的。

作者还是作者们？——决议创作了两幅文学肖像，如果引用他们的术语——描绘了两副“面孔”——或者说是，两位文学家。

左琴科的“面孔”是：他专门鼓吹庸俗腐朽、粗俗下流、不问政治，企图借此混淆青少年的视听，戕害他们的意识。左琴科是一个卑鄙下流的中伤者和藐视主义的说教者。

阿赫玛托娃的则为：阿赫玛托娃是敌对人民的、空虚庸俗诗的代表。她的诗停滞在资产阶级——贵族唯美派和颓废派的立场上，——“为了艺术的艺术”，不愿与人民走在一起。

这么说来，似乎阿赫玛托娃的崇高的抒情诗篇与左琴科的散文存在着某种联系，某种共同点？——阿赫玛托娃的诗根本不是什么抒情诗，只不过是把我们浸泡在齐膝深的尘事中的散文罢了。

这样就可以找到阿赫玛托娃和普希金、丘特切夫、安年斯基、曼德尔施塔姆、库兹明、勃洛克诗间的联系；找到左琴科和果戈理，也许和科兹马·普鲁特科夫与奥列伊尼科夫之间的联系。但阿赫玛托娃与左琴科又能有什么关联呢？这难不住决议的拟定者：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两个人都不是“苏联”作家。这点上不排除他们之间的联系。两人都毒害了国家和人民，都戕害了青少年的意识，都不能忍受我们的文学。

决议的起草者们对艺术一窍不通，他们不会用文学、哲学，不会用道德、社会的方式，甚至也不会用政治的方式去思考。他们只不过是一些搞行政的、习惯于行政思考方式的官僚。既然可以把有偷窃嫌疑的商店经理开除，为什么不能把反苏维埃的作家开除出文学团体呢？开除他们！拔掉他们！

8月14日的决议同所有的有关庄稼、黑色金属、铁路运输或者文学的决议一样，是以组织作出结论宣告结束的。没有组织结论还算什么决议？“鉴于上述”，“为整顿秩序”“取缔”一家杂志，和另一家“设有总编及其下属的编辑部”。

“任命 A.M. 叶戈林同志为《星》杂志总编，并保留其中央政治宣传局副局长职务。”

根据音节来判断，决议的作者是太统帅本人（显然，他依靠的是顾问）。全篇充斥千篇一律的单词，“庸俗的”、“不问政治的”、“有毒的”；“空洞的”、“异己的”、“颓废的”；又是“不问政治的”、“异

己的”、“庸俗的”、“空洞的”。这根本就不是什么词语,只不过是些早已废弃不用的词语的空壳。

每段都赫然掀起那两撇至尊至圣的髭须……日丹诺夫(政治局声名显赫的大知识分子)奉命阐释由新材料汇编成的社会报表。日丹诺夫作了两次发言:一次在列宁格勒党组集体会议上,第二次在作家会议上。日丹诺夫的粗俗漫骂使得新的极其公事化语调的历史文件走了样。其他的骂人话无法用词语表达,就没有记录下来。但就是报界认真予以再现的那些措词就已极富表现力了。比如,他对与会者说,左琴科是被《布尔什维克》杂志当众揭出的一个谤书作者、流氓渣滓。在他的报告中阿赫玛托娃被称作“狂怒的太太”、“准修女”、“准淫妇”。阿赫玛托娃把淫荡和祈祷掺和在一起,她“在小客厅和祈祷室里瞎折腾”。日丹诺夫简单地按照我们的方式——工人的方式,以布尔什维克的直率把阿赫玛托娃的诗断言为:“废品”。

淫妇和流氓在我们的文学中是没有地位的,我们不需要废品。但无论日丹诺夫的漫骂多么不堪入耳,但给当代人造成如此大恐怖的还并不是这类的漫骂。

1946年8月过去了,三十年的指示,几十年完善的残酷的术语深刻印在所有人的记忆中。“在立场上爬上爬下”、“贵族资产阶级流派”、“社会根子”诸如此类的词有如寒流——不是莫斯科的也不是列宁格勒的,而是克里姆林宫的——扫过你的背脊。从非苏联到反苏联,从异己的格格不入到敌对;从向西方卑躬屈膝到为外国情报机关效劳——简言之——从“妖言惑众者”到“人民的敌人”——俯手可拾。——引号里的词见诸报端!——“创作”、“活动”、“作品”、“威信”等词令人眼花缭乱,仿佛狱窗的栏杆;刻板的“请允许说创作”仿佛来自“远方的、十年没有通信的营地”的声音;而“组织”这个词干脆就像射向脑后的枪弹。看到日丹诺夫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报告,人们悄声地相互询问:“怎么样了?左琴科和

阿赫玛托娃还自由吗？”

人们清楚：战争虽然胜利结束了，但变化却丝毫没有……

报告营造了一种白色恐怖的氛围。记得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从莫斯科到列宁格勒的定期造访——判为枪决，或最幸运的剥夺自由 25 年。记得基洛夫被杀后的日子，所有邀请来斯莫尔尼宫的人都要检查三次入门证。听报告时，一个年轻女作家觉得头晕，当她奔到侧门，想快些出去呼吸新鲜空气——士兵却用枪交叉拦住了她。可以想象得出，斯莫尔尼宫讨论的并不是两家相当平庸的、任何情况下都不得罪人的杂志的工作，而是镇压喀朗施塔得水手新掀起的起义。至少是这样的。

每个文学工作者的脚下大张着无原则性的、贪婪的血盆大口。

我们是计划经济。几乎每个共和国都能发现自己的小淫妇、小谤书作者。于是如同 1937—1938 年，每个工矿企业，每个苏联机关，无论工厂、医院或邮局，都有义务揭露工作人员中在党组织鼻子底下（当然是丧失应有警惕性的）搞肮脏勾当的哪怕一个破坏分子、间谍分子拉去屠宰；1946—1947 年每个文学组织（无论作协分会、出版社或杂志编辑部）都有义务在工作人员中发现并揭批两到三个与苏联人民为敌的文学家。如果不是倾向于腐朽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就是反政治的；如果不是反政治的，也可以发现出为我们永远朝气蓬勃的青年所不容的悲观论调，如果这点也没有，最糟也能揭露文艺的缺点——世上不存在准确测量这个声名狼藉的文艺的幸福（左琴科曾写过文章《低品位的文艺》）。现在可以依据中央委员会决议为“高品位的文艺”而斗争。

服务人员纷纷下手。

沙吉娘报告说文学研究者古科夫斯基在其文章中提到俄罗斯寓言家克雷洛夫时表现出对西方的奴颜媚骨。克鲁申斯基汇报说儿童作家丘科夫斯基塞进杂志《穆尔济尔卡》一篇无思想性的童话《比比贡》。戏剧批评家纷纷揭露，如：列宁共青团剧院排演当代题

材的苏联戏剧的缓慢的速度令人怀疑；喜剧院及它的领导阿基莫夫明显表现出对西方剧目的偏爱。而诗人！新任作协总书记法捷耶夫戳穿了帕斯捷尔纳克的极端主观主义背离了人民；而其他的诗人出于友谊支持了帕斯捷尔纳克。列宁格勒大学人文系的所有教授——历史学家、语文学家、东方研究学者——一起被揭发对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文化谄媚。一个叫莫洛娃的人揭发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上映的童话《灰姑娘》的伪人民性。

“《灰姑娘》是一部伪人民性的影片，”莫洛娃在1946年的《列宁格勒真理报》上这样写道：“谁是影片的主人公？无从得知！谁也不明白这个童话。这里没有任何人民性！”

卡塔耶夫声称，决议使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新鲜空气。

呼吸着日丹诺夫报告的新鲜空气，文人受雇效劳，深挖无思想性、反政治性和崇洋媚外的根子。安娜·安德列耶芙娜·卡拉瓦耶娃慌不择食地揭露“谢拉皮翁兄弟”——二十年代，也就是四分之一世纪前以兄弟相称的散文家。在安娜·安德列耶芙娜·卡拉瓦耶娃笔下，“谢拉皮翁兄弟是名副其实的强盗兄弟。无怪乎左琴科正是从这个匪帮踏上了大路。”“现在当你读到‘谢拉皮翁兄弟’宣言书中的引文，会感愤怒和蔑视”，——1946年9月28日安娜·安德列耶芙娜·卡拉瓦耶娃检举，“这是一个不问世事、无所事事的好斗的‘流派’，是一群国内移民。他们致力于使苏联文艺偏离正轨。”卡拉瓦耶娃揪出了德国作家恩斯特·特奥多尔·阿玛捷伊·霍夫曼。正是从她的文章中，对腐朽的西方卑躬屈膝的、罪恶的“组织”或“流派”，盗用了称呼……这个特奥多尔·阿玛捷伊的作品到底是什么？“这是，”卡拉瓦耶娃写到，“幽灵迷信的荒漠，反动官僚幻想和神秘主义的荒漠。”这个宣言中的六个词有四个是外来词，“幽灵迷信的荒漠”到底所指为何？

卡拉瓦伊——俄罗斯词。卡拉瓦耶娃——地地道道的俄罗斯姓。而神秘主义、反动性、幻想——这些词和借用来的“谢拉皮翁”

都来自该诅咒的西方。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地对西方的一切辱骂痛斥,那又为什么用“幽灵迷信”、“反动”、“神秘主义”这些词?

不知您是否注意到:热恋于压制那些向腐朽西方卑躬屈膝的人连母语都不会说,他们不知道活的俄语,感觉不到;引进外语,依照俄语的音节构造新的俄语(只有人民和诗人才善于)——他们不会;他们只会用俄语骂人。请再看看他们的通告、决议和报告评论,没有前缀“а-”或“антн-”;没有后缀“-изм”或“-ист”,对他们来说,什么词都不复存在。俄语词“蔑视”被他们改造成了“藐视主义”。

“左琴科的藐视主义”。“藐视分子左琴科”。

远见卓识的讽刺小说家、天真善良的宣言人左琴科希望通过自己的讽刺和宣言来唤醒良知的“感伤主义小说”和“可尊敬的公民”里的所有的人物——一些市井无赖、钻营之徒、恶棍,吸够了“决议新空气”从左琴科的书中走出,扑向自己的揭露人。“大骂他,伙计们!抓住他!在这儿!过来,哥们儿,来追上他!抓住他,哥们儿!”

迫害阿赫玛托娃就不太好办,战争期间不小心地承认了她是爱国者。过去她是永世不得翻身的纯粹的室内资本主义女诗人,只写自己的那些微不足道的爱情苦痛,但是伟大的卫国战争(只是伟大的卫国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不算),突然唤醒了她的爱国主义良知。于是决定称赞阿赫玛托娃的《光荣的事业有了光荣的开端》、《夜之女神》、《胜利站在我们的门外》这样的诗,不因为别的,是因为她的爱国主义。《英雄气概》于1942的3月8日登载在《真理报》上,而不是别的报上。

但1946年的决议证实,阿赫玛托娃一直在所有时期,甚至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也对人民和俄罗斯的命运漠不关心。由于阿赫玛托娃的诗神总是历史的缪斯,由于她的缪斯的宠儿总是故乡的土地(“但愿黑暗的俄罗斯上空/乌云变成霞光辉煌照耀”——诗人

永远的祈祷),赤裸裸的谩骂显得苍白无力,就开始搞些舞弊欺瞒的小伎俩:批评家们就像打牌作弊一样,篡改、曲解诗句和日期。于是在1946年9月14日,塔玛拉·特里福诺娃在《列宁格勒真理报》上发表题为《毒害人民的异己诗》一文,大胆地把1941年前的战前诗篡改改为“1942年”,结果好像阿赫玛托娃在列宁格勒被封锁时,在城市里漫步游荡,欣赏着运河水里金色尖顶的倒影。

啊!世上可曾有所熟识的,

如同这水中尖顶的辉光和反光。

四周炮弹轰鸣,硝烟四起,人们在牺牲死亡,而她却在欣赏尖顶的辉光和反光。这不是对市民同胞命运的冷漠吗?塔玛拉把《英雄气概》也评为反人民的诗。

“……那建立在一年时间上的,

崇高自由心灵上的坚不可摧和忠诚无比的东西,

就是友谊……”

如果友谊是一种自由,我想,当然有走过你身旁的权力……但怎么可能是坚不可摧的呢?我倒什么也没毁坏。

我把珍贵的礼物收进桌子的抽屉里,开始写札记。

不是关于阿赫玛托娃的而是关于别人的。1942年2月我开始写,并且虔诚地写下去。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来到塔什干后,教育人民委员部“社会秩序”科,立刻吸收我加入“援助疏散儿童委员会”的工作。我探视了孤儿院的儿童——乌克兰、白俄罗斯、沃罗涅日、基辅、库尔斯克、列宁格勒的,从祖国各个角落运到大后方——塔什干。

很多孩子都没父没母:父亲死在前线,母亲在城市、乡村,汽车或火车遭空袭时被炸死了。很多孩子都不知道,他们的亲人是死是活?妈妈死了还是在到处找我?父亲战死了还是受伤了、失踪了?很多孩子的父母也不知他们怎样了:轰炸、火灾、射击时,他们和儿女失散——母亲们四处寻找,孤儿院当时分布在西伯利亚和

整个乌兹别克斯坦。

委员会的第一步工作：登记孩子的名单和他们所在孤儿院的地址……困难的是三两岁、四岁的孩子只知道自己的名字。“果里亚，你妈妈叫什么？”沉默。“爸爸呢？”长久沉默后：“叫爸爸。”“你过去在哪儿住过？”廖夫回答：“妈妈、爸爸和外婆那儿。”

国家慷慨供给孤儿院面包、牛奶、肉、被褥、衣服，还有苹果、葡萄。但慷慨也带来了不好的一面：窃贼们被安排当庶务主任、厨师、经理，无论真切关心孩子的教育工作者、教育人民委员部，还是委员会，对这些从天而降的窃贼都无能为力。

亚洲的一切都大得惊人：硕大的星星、月亮，盘子般大的玫瑰，胡萝卜齐膝高，核桃赛似苹果，还有像狗一样大的乌龟。塔什干（当然不只是这儿！）的偷窃数目惊人。我还记得，满载大衣的三吨载重卡车没有驶向孤儿院，而是径直奔向市场；冬天送来修葺孤儿院卧室的材料统统被弄去盖新楼——院子里盖起了经理的私人宅邸。

窃贼与监察机关狼狈为奸，事实上没人对他们采取措施。国家以为对孤儿院的供应非常充足，而那儿却坏血病泛滥。人民委员教育工作者和委员会成员竭尽全力：一级级向上写信控告，悄悄拿出自己的东西给最疲惫饥饿的孩子吃；尽力使他们忘掉悲伤，快活起来；帮助无父无母的儿童组成新家；给他们过节，收集玩具和书。

比得到国家的照顾更幸福的是那些被收养的儿童。当地居民——乌兹别克人、俄罗斯人、鞑靼人——接收了孤儿：收为养子女。“有人收养果里亚了”，“可我还没人要，我是红头发”，被收养的孩子比其他孩子更幸福，虽然未必新家和好人家（我见过许多好人家）能还给他们童年。他们的心灵受到了摧残，儿童身上所特有的对人的信赖也不复存在。他们不再相信人，相信生活。他们无法消除自己的恐惧，即使清楚地知道并没什么可怕的。我不止一次

看到成群结队在街上走着的少年,听到自远而近传来的飞机的轰鸣声,突然四散而逃,跳进灌溉沟渠或趴在泥泞的地上。他们无比惧怕这嗡嗡的轰鸣,虽然敌机从没在塔什干出现过。

我没马上反应过来应记下孩子们的讲述,没立刻意识到我的面前就是活生生的真实;如果不记载下来,错过了,那就是罪过。白俄罗斯人、欧洲人、乌克兰人、俄罗斯人。孩子们来自基辅、库尔斯克、涅任、明斯克、列宁格勒。我记得一个来自库尔斯克近郊的十一岁的小女孩给我讲起他们在德兵统治下的生活时,我才来了灵感,开始执笔的。一个德国军官停驻在他们村。“他不凶,给我们罐头吃,可是有一天晚上他抱起妹妹——一个吃奶的小孩——一下子就扔进了井里。她才刚满四个月。他把她抱出摇篮,悠着——他悠得很好,可能他家里也有小孩——她不哭了。他就走到院子里,一下子就把她扔进了井里。”“这到底是为什么?”我嚷道。“您怎么了?您没见过德国人吗?”小女孩很不屑,“妨碍他睡大觉了呗,就扔掉了她。我们院里所有的井都漂着吃奶的孩子。”

在这第一次讲述后,我开始经常记录孩子们的口述。一些孩子避而不答,忧伤地躲开我,另一些非常乐意,很贪婪地讲述着,仿佛是他们自己的需要。

瓦洛嘉,十二岁的小男孩,来自白俄罗斯的利达市,胳膊上脸上全是烧伤:

“我被玻璃震动发出的嗡嗡声惊醒了——我们住的房子周围是铁路,玻璃被火车震得嗡嗡响。可是这次不是这种响声。我跳起来一看,430路客车停在路口冒着火苗。突然一声锐响,司机猛然开动火车,炮弹击中尾部的邮车。

“火舌舔着信件和邮包,火焰冲天,照如白昼。

“男孩们从技校里跑出来,赶紧向外抢救邮件。我和他们一起跑来,抓住一包信件。它在我手中颤动着,扭曲着,火苗突然从里面一下子扑向我的脸。”